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

中国崛起的 时间和空间

黄仁伟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黄仁伟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

ISBN 7-80681-084-6

I. 中... II. 黄...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②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5②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640 号

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作 者:黄仁伟

责任编辑:常 工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4.75

插 页:2

字 数:98 千字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500

ISBN 7-80681-084-6/A·007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论 中国崛起：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 21 世纪中国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全球范围力量格局的空前深刻的变化。对此,有学者称之为“新大陆发现以来的又一次新大陆发现”。这虽有夸张之嫌,但是却道出了几分真谛。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拥有全球 1/5 以上人口和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这样一个坚持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大国的崛起,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的伟大复兴能否实现,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将产生什么影响,已经成为世界上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巨头关注的焦点,成为各国战略家和知识精英思考研究的课题,成为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象。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全局性难题几乎都具有国际战略的背景或直接涵盖在国际战略的范围之内。例如: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统一战略三者之间如何协调

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将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变革将产生哪些冲击,我们的承受力如何;全球网络和信息化发展对我们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将产生什么冲击;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哪些国际条件作为保证,我们如何实现这些条件;祖国统一大业应如何增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同时保持对台独势力的强大压力;在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接受和改革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全球化和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带来哪些挑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去认识和分析,在这些战略难点上取得重大突破。

所幸的是,江泽民主席的“七一”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展开有关中国崛起的战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巨大的理论空间。许多过去难以突破的战略“瓶颈”找到了出口和通道,许多在传统理论上无法解决的核心概念问题得到了论证和界定。这就为我们开辟国际战略研究的新领域、新思维、新结论提供了机遇和可能。江泽民同志在今年“5·31”讲话中又特别指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更是为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提出了具体的框架。因此,“中国崛起”这个不可回避的重大战略课题,就成为我们倾注全力展开探索的焦点。正因为这个课题太重大了,我们的任何努力都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中国崛起”的内涵极为丰富。如果我们把“崛起”的目标定位在“成为世界强国”，也可以有多种标准。我们在这里初步界定为以下内涵：

- 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主要大国的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是亚太经济）具有明显的拉动能力。
- 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主要科研领域拥有一流的成果和专家队伍。
- 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对均衡，但有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发达经济的质量。
- 中国能够驾驭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复杂矛盾，能够预警和防范全球资本流动引发的金融危机，也能应对其他跨国非传统威胁。
- 中国通过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结合，引导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与周边国家形成紧密型东亚经济政治合作框架。
- 中国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结合的多种途径实现国家的统一，并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
- 中国基本完成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对国际体系重构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过程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 中国拥有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战略利益的各种威慑和反威慑手段，可以根据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感需要，对全球和地区问题作出自己的战略选择。

- 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地区集团结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和战略合作关系,任何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战略企图不再有可能实现。
- 中国拥有较强的文化竞争力和其他软力量,中华文化和全球文化的融合产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强大亲和力。

“中国崛起”将面临极为复杂的内外环境。我们可以把今后 15—20 年的国内外环境分解为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

有利因素大致有:

-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我们仍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
- 我国的经济总量将比 2000 年再翻一番,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态势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 我国与主要大国和主要经济集团的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形成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
- 我国成为带动和稳定东亚经济的主要因素,可能形成的东亚市场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
-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台取得战略突破,祖国大陆与台湾、港澳地区之间形成经济联盟。
- 多级化格局出现明确的轮廓。欧盟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差异扩大;俄罗斯的实力得到恢复;日本、印度、韩国等地区大国也拥有一定的战略影响力。
- 我国在文化、信息、网络等软力量领域的弱势状况得到改变,对国际思潮和文化的渗透力得到加强。

- 我国通过融入和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开始改变被动接受旧国际秩序的局面。
- 我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进入新阶段,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具有吸引力。
- 我国军事力量可保证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完整性,具有高技术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力。

从上述要素的组合来判断,我国在 2015 年到 2020 年间将具备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可能性。

不利因素可能有：

- 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安全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和平因素对战争因素的制约作用削弱。
- 美国把中国崛起作为其重大的潜在威胁,亚太地区成为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重点。
- 美国为了在战略上对中国进行牵制,在我周边地区形成盟国体系、基地网和军事准入通道。
- 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复杂化。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实际上形成,统独摊牌的危险性增加。
- 东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我国同构竞争激化,发达经济亦加强对我反倾销,我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双重压力之下。
- 中国经济的迅速膨胀引起世界能源、粮食等资源供应的紧张,我国发展可能出现战略瓶颈。
-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上升,某些主要邻国可能联手对我施加压力。

- 我国受到国际机制的“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联动效应突出。
- 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条件下，西方势力竭力扩大中国内部的离心倾向，对中国的官方宣传构成冲击。
- 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技术控制的力度，争夺高科技人才成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预测今后 15 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在经济领域的机遇较大，安全领域则风险上升。利用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市场潜力，推进与各国各层次的合作关系，参与各种国际机制，化解安全领域的潜在危机，应成为中国崛起第一阶段的战略突破口。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必然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相互关系和力量消长。重新认识这两种制度的内在关系，对于思考中国崛起的战略和策略极为必要。同时，研究时间和空间，不能不对“时代特征”作出判断。这种判断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我们不能拘泥于原有的判断，但是也不能割断历史的连续性。时代特征必须是反映世界发展进程的主流，而不是各种现象的罗列和简单相加。在上述两个大判断之下，中国崛起需要新的战略概念。在这里，我们主要展开的是“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两个概念。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建立共同发展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这应当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过程中追求的目标，也应当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在相互安全中保证国家安全，在全球安全中追求本国安全，应当是中国新的安全战略思维。“共同利益”是

国家利益的延伸和扩展,“新安全观”是国家安全的重新构造。超越传统思维,在战略思维上突破旧观念的禁锢,是为“中国崛起”避免旧的历史重演、开辟更广阔前景的重要条件之一。

作为这个进程主体的中国,实现其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必须有一整套战略和战略理论配合。战略和战略理论应当具有全局观、超前性和可选择性。所谓“全局观”是对中国内部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的综合分析,是对中国外部环境各种要素的综合平衡,是对内外两种环境互动和交叉影响的综合判断。所谓“超前性”,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10年为一个时间段)或若干个连续的时间段内(30年到50年),各种力量消长的曲线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的交叉;或者当中国发展达到某个高度的时候,内部或外部的某些因素发生突变对中国的上升进程可能产生的冲击;或是中国内部结构和力量的变化引起外部环境的震荡,导致大的区域范围或世界范围的结构调整甚至剧变。所谓“可选择性”,是对不同时间段内可能发生的不同前景,有准备地提出不同的战略调整和策略选择。因此,战略是全要素的、长时段的、多选项的目标和手段设定。作为研究战略的思维框架,需要在理论上找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或潜在的战略缺陷,提出新的战略逻辑和思想方法。这就是我们从事新战略论研究的目的。

目 录

序论 中国崛起:一个不可避免的战略课题	1
一、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评估	1
1.1 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	1
1.2 中国崛起是否会重蹈德国、日本、前苏联 的覆辙	4
1.3 中国崛起是否会在亚洲恢复“中央王国”	8
1.4 中国崛起是否会导致另一个“美国式霸 权”或取代“美国霸权”	11
1.5 中国崛起是否会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构 成竞争和威胁.....	15
1.6 中国崛起是否将导致“中国威胁”或“中 国崩溃”	17
二、中国崛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20
2.1 中国崛起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来自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22
2.2 中国崛起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低潮的历 史背景下.....	24
2.3 中国崛起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互	

为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崛起的制度保证	30
三、中国崛起与时代特征	37
3.1 邓小平是如何认识和坚持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的	38
3.2 “和平与发展”内涵的变化和丰富	44
3.3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征	49
四、新安全观与共同利益	55
4.1 “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的历史条件	55
4.2 东亚地区合作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	64
4.3 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	71
五、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	80
5.1 中国的国际环境演变和现存结构	80
5.2 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与国家安全系数的关系	87
5.3 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市场潜力的关系	91
5.4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关系	96
5.5 国际体系、国家主权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关系	104
5.6 国家认同、凝聚力和文化软力量的关系	109

5.7 军事实力、战略威慑力和总体实力的 关系	113
六、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中美关系和台湾 问题	117
6.1 中美关系的两种前途	117
6.2 祖国统一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 安全战略的关系	122
七、中国崛起的前景选择	129
后记	138

一、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评估

- ▶ 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 ▶ 中国崛起是否会重蹈德国、日本、前苏联的覆辙
- ▶ 中国崛起是否会在亚洲恢复“中央王国”
- ▶ 中国崛起是否会导致另一个“美国式霸权”或取代“美国霸权”
- ▶ 中国崛起是否会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构成竞争和威胁
- ▶ 中国崛起是否将导致“中国威胁”或“中国崩溃”

“中国崛起”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界所关注的课题。西方学者的各种预测虽然明显带有偏见,但也有可吸取的合理成分。他们的观点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参照系,作为我们新国际战略论的起点。

1.1 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舆论(主要是西方舆论)看来,中国

崛起的首要问题是,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将成为对现存世界体系的稳定因素和建设性力量,还是不稳定因素和破坏性力量。根据历史的经验和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多数西方观察家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改变现存的世界体系。其中相当一些人认为,中国可能成为现存体系的合作者,但是更可能成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问题在于,中国将如何改变现存世界体系,中国在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将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

所谓“世界体系”,是以现实力量对比为基础的,由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构成的,形成对各国行为具有制约力的力量格局和国际体系。由于它在较长时期内的稳定性,使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行为体把它视为某种“世界秩序”。

现存的“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从近 500 年世界近现代史延续和演变过来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和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变为新兴独立国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国家主宰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接着世界进入两大集团对抗的冷战体系,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对峙、对抗。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纳入了这个冷战体系之中。直到 20 世纪最后 10 年,冷战体系解体。

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是世界体系的趋势。但是,在多极化结构尚未完全形成前,世界体系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特征。美国的超强地位和单边主义行为试图以“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来支撑 21 世纪的世界体系。同时,

旧殖民主义体系和冷战体系的残余结构和力量仍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世界体系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准则。

新中国诞生以来,其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就是与世界体系的这三次历史性转变紧密相关的。它既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作为殖民主义体系和西方主宰的旧秩序的挑战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历史特征成为当代西方大国“中国威胁论”情结的由来,也是中国与现存世界体系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以至某种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在冷战体系中先后与两大集团的领导国家发生对抗,并且长期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成为中国与现存世界体系存在距离和摩擦的更直接原因。同样,中国的任何重大国际行为或重大的国内政策调整,都会对现存的世界体系产生深刻影响。例如,19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突破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都直接推动了冷战体系的瓦解。因此,当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前列时,世界体系不能不发生改变。问题在于改变的速度、方式和程度。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根本上是由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是由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作用所决定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决定以现代化建设为工作中心;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2001年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重大事件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行为变化的三个转折点。这三次重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现存世界体系的关系,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行为准则。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国际行为主要是融入和适应现存的世界体系,是在以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市场上取得我们发展所必需的资源 and 条件,是以世界贸易体制为基本规则来实现内部与外部市场的接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与全球化体系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互依存也大于相互排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进程越是发展,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融合程度就越高,实际上中国改变世界体系的能力也越增强。在此过程中,中国与现存体系的摩擦也会增加,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冲突。但是,这是正常的体制摩擦、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不可避免。

1.2 中国崛起是否会重蹈德国、日本、前苏联的覆辙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其崛起过程以及可能引发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是各国战略界研究的重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借鉴历史上后起的大国案例时,经常将中国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1920—1930 年代的日本和 1950—1970 年代的前苏联加以类比。通过这种类比得出的一个概念就是“正在迅速崛起而又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的大国”,简称为“不满现状的大国”。

在西方战略学界的观点看来,所谓“不满现状的大国”,

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是它们都在较短的时间(20—30年)内上升为全球性或地区性大国,其力量往往达到仅次于原来的头号大国即霸权国家的地位。但是,它们又很难取代原来的霸权国家和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因此,它们不满于国际秩序现状并竭力挑战和改变现状。

二是由于“维持现状的大国”即霸权国家担心后起的大国取而代之,通过组织盟国体系或军事集团,对后者进行牵制和围堵,限制其发展空间,从而加剧了“不满现状的大国”的不满。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走向对抗,导致世界大战或冷战。

三是后起的大国虽然力量上升很快,但是其综合实力仍与“维持现状的大国”有较大差距。为了对抗霸权国家,后起的大国一般都急剧扩充军事力量,并在本国周围构筑安全带。这种军事竞赛造成世界范围的紧张局势,并且在一些战略要地和内乱不断的小国引发局部战争,成为世界大战或冷战的前奏。

四是后起的大国都具有不可克服的制度缺陷,如德国的帝制和纳粹独裁体制、日本的天皇和军部体制、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集权体制,等等。这些制度性因素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带动它们的国力上升,但是在长期竞争中就遭到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的限制和抛弃。其结果无一不是在体制上的失败而导致战败或国家解体。

西方战略界对“不满现状的大国”研究从一般的特点深入到各个国家失败的特殊原因,特别是将其中与中国崛起